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歌民谣之兴盛及缘由

朱 小 敏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摘 要: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歌民谣是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和社会影响上都做出了突出的特殊贡献。由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大后方的民歌民谣长期无人问津,成为抗战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应从当时的文学实际出发,从历史主义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文学观来予以评价。其兴盛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创作时间持续久长,作者众多作品量大;二是地域分布广,影响范围大;三是题材内容社会性强,丰富深刻;四是文学形式灵活多样,精彩纷呈。其兴盛原因主要有下述几点:一是适应抗战文学需求的文学特性,二是文学社团和机构组织的大力推动,三是理论界的强烈支持倡导,四是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创作,五是出版界的鼎力相助等。

关键词: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歌民谣;通俗化;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3)01—0014—08

在抗战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少的空白和尚待深入探析的领域。大后方的民歌民谣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立场、方法

抗战时期,大后方歌谣适应社会时代的需要,异军突起,成为战时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为抗战文学和“抗战建国”的文学目的做出了极为特殊的贡献。但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抗战大后方民歌民谣的研究却几乎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不正常又令人颇为困惑的学术现象。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是多重而复杂的,需要我们去析清和究明。

早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时,茅盾就以《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为题,在总结国统区即大后方的文艺运动中,用阶级论文学的眼光和延安解放区的标尺来衡量国统区的文艺,“是长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地区内受磨折,受摧残而进行着苦斗”,肯定的只是“国统区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压迫下,和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及所取得的成绩,且对内部存在的那些没有“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缺乏社会本质关联,强调作家主观、人道主义等提出批评,而那些个人趣味的、庸俗的、颓废主义的小资性质的创作,特别是认定为“反动文艺阵营的所谓‘作家’们”,自然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抨击。^[1]这些说法,明显与抗战时期的历史状况和文学实情大有出入。我们并不否认,国共两党的最终政治目标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面有矛盾有冲突,甚至斗争,但这一切,特别是在国统区统治下的大后方,都必须服从于当时抗日救亡这个大主题、大前提。这是国共合作的双方都认同的,即或相互之间有争斗,也只能是暗中进行。还应明白,当时全国所有的抗日力量,都是统一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的,只要是抗日救国的文学,理当

收稿日期:2012-12-03

作者简介:朱小敏(1988—),女,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让人无可奈何的是,茅盾的总结讲话,无疑代表了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眼光,为建国后抗战文学的研究,定下了俗称左中右界限的基本调子,划出了一个文学评说的范围、框框。之后的抗战文学研究,基本上就限定在这样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够得上左的即进步革命文艺界资格的,只有少数紧跟或合拍延安文艺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小部分人,就连意见与之稍有相左的胡风及其麾下的“七月派”诗人(阿垅、绿原、牛汉等),亦在贬斥之列。其他的如梁实秋的“与抗战文学无关论”、沈从文的“作家从政论”等,更不用说以陈铨为首的“战国策派”,更是遭到严厉的批判。大后方文学正面研究的对象,基本上就限定在进步的革命的文艺界的部分人身上。而传统性质的民歌民谣的研究,不仅受着上述因素的影响,同时还有自身存在的认识问题。在新文学者的眼中,民歌民谣本就属于难登大雅之堂的低俗之作,且又归附于封建性的旧文学之列,历来就不受重视。现代文学权威级的理论家冯雪峰在抗战末期关涉到民歌民谣的文章中还提出:“……证明‘旧形式’可利用的有效的是非常的少;而‘民间文艺’的实质也渐被照明,大家不能不承认那里面有很多有毒的反动的要素和过于落后的东西……”^[2]可以说,这种正统与非正统、雅与俗、文人化与民间化之分的文学观念,同样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在他们看来,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那些民歌民谣,只不过是特殊年代下旧形式的利用和应急之作,是无法与新文学以来所建立的正统的革命文学相提并论的,根本就拿不上学术研究的台面,基本上处于一种尘封状态。

新时期之后,在思想解放的春风的吹拂下,抗战文学的研究得到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孤岛(即上海租界)文学、香港文学,还涉及到广大的沦陷区文学。更重要的是,单纯的阶级论的文学研究立场、方法开始松动,逐渐融进了以抗战为目的的民族性的爱国主义的和非阶级性的文学评价内容。“九叶派”诗人(穆旦、唐湜、辛笛等)的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得到重视和研究,“七月派”诗人的创作给予了重新的评价,而以往遭到批判的“与抗战无关”等论调甚至是“战国策”派等所谓反动性质的创作也在相当程度上“翻案”重评。继承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新诗方面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无论是诗人诗作的论文,还是专题的专著,层出不穷。唯独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歌民谣的研究,仍如一潭死水,不见一点涟漪。

大后方民歌民谣当下所处的研究状态,除了前述的总体的历史政治原因外,恐怕还与这些民歌民谣所产生的具体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内容紧密相关。

大家都知道,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文艺界也一改往日之纷争、歧见,结成文学上的抗日统一战线,把文学为抗战服务视为文学的最高目标。诚如朱丕智在《抗战爆发与文学观的变移》中所指出的那样:抗战爆发,民族文学观得以确立,并且“只有站在民族立场、民族利益、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之上的民族文学观,才可能超越各种分歧乃至对立的不同文学派别,在抗日救国和文学为抗战服务的旗帜下达成共识”。^[3]的确,抗战之后,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阶级论文学观开始隐退,让位于表现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抗日爱国的民族文学观。对此,属于国统区的大后方文学可以说表现得较为充分,特别是在民歌民谣方面。遍观大后方八年来的民歌民谣,其思想内容、情感情绪,除了抗日、爱国、国家、民族,还是爱国、抗日、民族、国家,几乎不夹杂其它方面的东西,阶级论的东西更是难见踪影。而延安解放区的文学包括民歌民谣则与之大有区别,除了抗日爱国的相同主题外,还有大量歌颂共产党、人民领袖、工农兵和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要明白,在解放区,阶级论的文学观从未消失,只是在表面的退隐之后,与民族文学观交错并行,且最终占据主流。^[3]显然,大后方全民性的民族文学观与以阶级论为基础的文学立场是有根本差异的。最为微妙也最为关键的是,大后方的民歌民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国民政府两个“总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国家总动员”——的产物,至少与其精神紧相关联,即举国全民抗战。

抗战爆发之际,敌我力量悬殊,形势急迫,为集结国民精神和举国之力一致抗日,国民政府对全国相继发出两个动员令:其一即“国民精神总动员”,有三个目标:“(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与(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4](171)}另一为“国家总动员”,要求“彻底加强全国总动员工作,使每一国民皆能更尽其对战斗之任务,每一物质咸能更发挥其对战争的效用”,并作出了各方面的工作部署,以早日取得抗战胜利。^{[4](273)}大后方的民歌民谣除了从精神上贯彻实行两个动员令的意旨外,还有直接反映两个动员令的作品,如《抗战总动员歌》:“我们举国总动员,何愁丧失的领土主权不收还!”^[5]

(本文中此后所引民歌民谣的资料,凡没有标注的,均出自《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还有《全民抗战歌》:“四万万同胞都起来呀!自己的责任自己担呀!啲呀嘿!呀呼嗨!我们要全民来抗战呀!”这样的民歌民谣,无异于是对国民政府在抗战方面的肯定。这对于那些习惯从党派的阶级的斗争立场来看待文学的人来说,当然就格格不入了。而人们在面对这些认识、评价上的冲突时,产生担忧、犹疑,也就毫不奇怪了。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的文学必须在文学的历史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合理的分析和评价。当然,要想准确认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歌民谣,还得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寻找到与之相吻合的文学立场和方法。在这方面,朱丕智提出的民族文学观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同时,他还专门撰文阐述了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其中最核心的观点是:“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成为所有抗战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该时期文学最高的又最基本的诉求,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民族文学立场。”^{[6](212)}以这样的历史主义的文学立场来认识、看待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学,就必然要求我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切政治的纷争,一切党派的歧见,乃至个人的恩怨,都被掩埋在全民族的共同利益之下”^{[6](211)}。大后方的民歌民谣,只有在这种以民族文学观为基础的民族文学立场、方法的观照下,才可能真正对其作品作出公正合理的历史评判。

事实上,在抗战期间,国统区的文学发展是极其复杂多样的。但有一个共同的文学目的却是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和不同文学主义、流派的作家都一致认同的,那就是“文学为抗战服务”。大后方的民歌民谣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掀起了持续不断的创作热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实绩,创建了中国民歌民谣史上一座独特的丰碑。现在,我们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性眼光去看待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学,重新对民歌民谣这一民间文学形式的作品加以关注和研究。这既是对它当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的总结和彰显,也可促使我们去全面、完整、真实的还原文学历史的本来面貌。

从上可见,填补大后方民歌民谣研究这个空白格外重要。通过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歌谣的研究,既可以把握其在抗战文学中的实际状态及文学特性,还能对大后方人民在该时期的抗战激情、精神风貌、行为举措有详细的了解,从中可反映出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抗战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在此不可能多方面地去探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歌民谣,仅对其兴盛表现和原因作出论析。

二、大后方民歌民谣的兴盛表现

民歌民谣作为一个文学品类,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化或者说附庸的地位。正统的主流文学所谓“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雅与俗之类的评价,下里巴人、俗的言说,就包括了传统的民歌民谣。这是一种民间老百姓自发性的创作,零散、偶发、断断续续,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文学气候。新文学爆发、产生以后,陈独秀就提出了三大主义之一的“国民文学”^[7],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学”^[8]。从表面看,这些提法似乎与民间老百姓的民歌民谣有一定关系,实际上却毫不相关,一点也没有涉及。必须明确,国民文学、平民文学完全是在新文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西方文学新的思想、方法、样式占据着文学的主流,传统的民歌民谣受到封建旧文学的牵连,是归属到“旧”的被批判行列之中的,对新文学者来说,完全不屑一顾。之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为工农群众服务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左翼文学进行过几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欲使文学从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从而让更多的人走进文学。但是文艺大众化一直有着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目的,注重的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学样式,同样没把这种古老传统的民歌民谣放在眼里。在此期间,民歌民谣似乎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直到抗战前夕,对旧形式利用的讨论可以说才涉及到民歌民谣的问题。由于民歌民谣和封建文学难以辨清的关系,一个“旧”字,只谈形式,就足以见出人们的态度,所以,即便是对旧形式的利用,论者们的意见也很分歧,在创作方面,始终也没形成什么气候。

抗战爆发后,文学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了加强抗战的宣传工作,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首次具有了全民的民族的性质,成为应抗战急需的文学创作潮流,由此带来了新旧各种文学样式的大发展。正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和文学形势的急切需要下,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歌民谣创作汇入了

抗战文学运动的时代洪流,迅速蓬勃崛起,遍及整个大后方,八年期间从无间断,创作了数量巨大的民歌民谣,成为中国民歌民谣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高峰。

概括而言,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歌民谣兴盛繁荣的表现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评价。

(一)创作时间持续久长,作者众多作品量大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歌民谣作为民间老百姓一种自发性质的创作,是不可能具有创作的连续性的,有一首算一首,相互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正因为此,我们几乎看不见在中国的民歌民谣史上,有过持续创作的一个时期。另外,即使从主流文学的层面来看,一般而言,某种文学样式或许会风行一时,虽不像时装那样,转瞬即逝,但要经久不衰,却是难以做到的。而大后方的民歌民谣在抗战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崛起后,能保持长盛不衰,确实算得上一个文学上的奇迹。

通常,民歌民谣的创作都是某地某一时段无名者的单独行为,但大后方民歌民谣的创作却完全不一样。在抗战救亡的感召和共同的文学功利目的追求下,人们纷纷以笔为戎,奋力创作,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的作者群,有名有姓(部分无名姓)的作者就达数百之众。从他们创作的作品数量来看,仅据《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选编出的这部分歌谣统计,整个抗战期,共计563首。从1937年至1945年,八年间,每年的数量基本持平。抗战初期数量稍大,1939年最多,一年内达到131首。如果算上未选、漏查的、已经失传的以及大家熟知的老舍等人创作的大量的民歌民谣,数量会更加巨大。这是特殊的战争年代所造就的文学奇观。大后方民歌民谣的创作能持续八年之久,作者自觉参与之众,作品数量之多,此前绝无仅有,之后也很难复现。

(二)地域分布广,影响范围大

传统的民歌民谣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学品种。由于受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和社会政治以及地方方言等因素的影响,民歌民谣的创作、传播大都限制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受众面较小。但是,抗战的爆发和社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古代相对封闭的创作、传播格局。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大后方区域,统一的政令和社会行为(当然包括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不再受地域的限制,都能基本得到畅通、有效地施行。同时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陆续聚集到大后方,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从西安到成都、贵阳、昆明、桂林等多个文化中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民歌民谣的创作,已经突破了地域的束缚,不管东西南北中,各地的歌谣纷纷上阵,形成一种集体表演的场面。同时,民歌民谣发表的主阵地虽在重庆,但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遍及整个广大的国统区大后方。除了前述的多个文化中心外,还包括湖南、四川、陕西、甘肃、广西、贵州、云南等的某些城镇。在抗战的八年间,大后方民歌民谣的创作、发表、传唱,辗转流传,盛行一时,大大激发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积极影响。

(三)题材内容社会性强,丰富深刻

泛泛而言,传统的民歌民谣也有社会性,这是没有错的,但若与抗战大后方的民歌民谣相比,前者较之后者,就远不如后者与社会联系的紧密性强。

从创作和表现的视角去看,传统歌谣基本上是立足于个人立场,侧重抒发个人性的际遇、情感,而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歌民谣,则完全立足于国家、民族的立场,表达的是全民的社会的整体的精神、情感、意识。当然,传统的民歌民谣中也有极个别的优秀之作,与社会有较深的联系,如汉代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该民歌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宗法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家长专制和宗法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的是,大量的更多的传统歌谣与社会的关联度是较低的,题材内容也非常狭窄。从全国各地流传至今的优秀的民歌民谣来看,绝大部分都是表现男女婚恋的个人情思、言行,阿哥阿妹、情呀爱呀之类的东西充塞着整个作品。而大后方的民歌民谣则超越了个人的狭小圈子,把个人的情感融入进国家民族之中,内容题材涉及到抗战爱国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前面我们就提到的反映国民政府两个动员令的民歌;描写大后方人民响应政府号召的《劝买救国公债通俗歌》,歌谣中主要是倡导国民去买救国公债,发展经济,支持前线作战的战士更换新装备杀敌;动员民众上前线杀敌的《不吃糖,救灾殃》,歌谣描写后方群众为支援前线抗战,省吃糖的行为,这从侧面反映了群众的

斗争精神;描写前线激烈战事的《歌八百壮士》、《抗敌歌》,歌谣通过描写前线斗争的惨烈,来反映我军战士的英勇无敌;《示威歌》通过情感的抒发和愤怒的呐喊,表达了大后方人民对敌人侵略行径的强烈控诉,鼓舞群众拿起武器去和敌人做最后的斗争。除此之外,歌谣中还有描写民兵斗争的,歌颂英雄战士的,以及暴露鞭挞叛徒汉奸丑恶嘴脸的,等等。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歌民谣,上至国家的方针政策、抗战大事件,下至社会各界和军民的抗日行为、精神,凡与抗日有关的,无不涉及,可以说是与整个国家、民族同命运、共呼吸,充分表现出人们高昂的抗日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

(四)文学形式灵活多样,精彩纷呈

由于抗战的爆发,全国各地各界的文化人士聚集重庆和大后方,由此也带来了各地多样的歌谣形式,大大丰富增强了民歌民谣的文学表现力。众所周知,传统民歌民谣的创作、传播,通常都是在当地发生的,不可能异地而作。而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歌民谣的创作,已不再有地域的界限、区分,在整个大后方,几乎集合了全国各地典型的传统歌谣形式,如:凤阳花鼓、山西小调、山东大鼓词、陕北秧歌词、河南坠子、四川的竹枝词和金钱板,以及弹词、数来宝等等。这不仅使作者可以任意地选择适合的歌谣形式,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了歌谣作品创作表现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个时期的歌谣还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表现方式,例如长歌谣、组歌组谣、歌谣配连环漫画,甚至包括本不该有成人内容的童谣。此外,还有不少以新诗形式创作的新民歌,如《民国二十八》:“民国二十八,日兵遍地爬。遇我老百姓,男女尽屠杀。”再如以长、短句的句式写的《难民之歌》:

咱们都是逃亡的人哟,老乡!

记不清是多少年月——

总之,是一个遥长的时间啊!

咱们没有了家乡!

……

这都可以说是在民间形式上对新诗的某种创新。作者们还根据民间的民歌民谣的样式、方式,精心创作歌谣,新颖出奇。如:凤阳花鼓《不吃糖,救灾殃》、四川的《抗战竹枝词》和长篇组诗《抗敌金钱板》、山西小调《乡姑娘上战场》、扬州小调《抗敌小调》、无锡景调《国难小调》、陕北秧歌词《哥哥骑马打东洋》、鼓词《哑子投军》、长歌谣《游击队雪地退兵》、组歌组谣《送郎出征》、歌谣配连环漫画《开封大除奸·拉洋片唱词·连环漫画》、具有地方风味的《塞北民歌》、短篇叙事诗《伟大的国旗》、童谣《大刀队》与《打东洋》等等,这些多样化的民歌民谣生动活泼、精彩纷呈,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大后方民歌民谣之兴盛原因

特殊的年代总会造就特殊的文学现象,大后方民歌民谣的兴盛必然有其特定的深刻的社会历史缘由。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古代的民歌民谣始终处于文学的末流,若即若离,可有可无。《诗经》的“风”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偶有幸存下来的一些优秀歌谣,恐怕也经过文人之手。即使如此,由于这种歌谣是民间性的群众性的作品,地位总比不上文人士大夫的“雅”与“颂”。新文学之后旧体诗更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民歌民谣也处在排挤之列。几千年来,民歌民谣从未产生过哪怕是短暂的集体性爆发的创作,但是,为什么在抗战时期又会崛起兴盛,持续繁荣呢?

总体上来说,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巨大的诱因,它改变了当时中国内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矛盾,把一切问题都凸显集中在民族矛盾之上。国共之间达成了合作协议,奠定了全国统一抗战的政治基础。文艺界也一改过去那种斗争、分歧的局面,不再固执于自身阶级阶层和不同文学主义、流派的文学看法、观念,转而统一到一致认同的“文学为抗战服务”的旗帜之下。恰如抗战爆发之初,《新华日报》社论便指出:“文艺家们从来因为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理论方法的不同,未能调合在一起。他们为民族自由的斗争,仅只是各自为战,因此而致力量的分散,步骤的参差,使文艺这个有力的武器,没有发挥出他最高的功能,这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巨大的缺陷。然而这缺陷终因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决

的执行,逐渐地弥补了。”^[9]正因为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抗战时期,由于抗战的需要,多种流派、品类的文学作品更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宣教性,将文学作为服务于抗战的武器,用作品去反映抗战现实,给人们输送精神食粮,鼓舞和激励人们去奋力抗击日本的侵略。

具体来看,我们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歌民谣的兴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适应抗战文学需求的文学特性

抗战的爆发,使人们的文学观念得到空前的统一,文学创作成为了作家们的精神武器,所有的作品中都弥漫着昂奋的民族心理和时代气氛。文学的宣传、武器功能被提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全国文协在其宣言中就发出号召:“我们的工作由商讨而更切实的到民间与战地去,给民众以激发,给战士以鼓励。这样,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的力量定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定会与前线上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愤与钦仰。”^[10]作为全国文协负责人之一的老舍也发表文章提出:“精神食粮必须普遍地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炮,而不能却缺乏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11]但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势下,又应以怎样的文学方式作为精神食粮,去发动、激励、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敌意志、精神和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念呢?文艺界很快就给出了积极的反应和回答,那就是短小、方便、快捷的文学品类。于是,诸如通讯、报告、诗歌、街头诗、街头剧、活报剧之类的文学样式,应时而生。这是一个急需短平快文学作品的紧迫时期,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短小文学样式的发展。胡风在总结、赞扬“报告文学”这一轻快型文学武器时就说:“借着它,文艺更直接地和生活结合,更迅速地替战斗服务。”^[12]而民歌民谣恰好具备上述这些文学特性和条件。它体量轻小,创作快速,语言浅白,通俗易懂,能对抗战的社会现实作出迅捷的反映和传播;更重要的是,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民歌民谣在中国老百姓之间有着深厚的接受传统,人们喜闻乐见,有利于抗战的宣传、教育。民歌民谣在该时期的兴盛,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文学社团和机构组织的大力推动

不必讳言,抗战时期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是非常落后的,要想推动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实行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是极其必要的。因此,各文学社团和相关机构组织都大力推行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而民歌民谣则是其最有力的文学工具。1938年,“文协”成立,形成了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协”在成立大会上就指出:“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9]随即又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等口号,推行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得到广大作家们的积极响应。周恩来也为《新华日报》撰写专论《怎样进行第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在艺术宣传上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13]抗战期间,全国文协及各地分会举办了多次有关通俗文艺的座谈会、研讨会、讲习班,推进通俗文艺的创作、宣传工作。《新华日报》还进行过多次民歌民谣的征集发表活动,共计发表了40余首民歌民谣体作品。^[14]此外,教育部及相关机构组织还有计划的组织了一系列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阅读、宣传等活动,如抗到底社、通俗读物刊行社、教育部民众读物处等就开展过多次相关活动。显然,各文艺社团和社会各界相关机构组织的大力推动,无疑为大后方民歌民谣的发展,注入了强大而持续的推动力。

(三)理论界的强烈支持倡导

抗战时期,尽管歌谣在人们心目中的文学地位并未根本变化,有急需及权宜之用的意味,但其实际地位已得到极大的提升,大后方的民歌民谣的确在抗战文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受到人们普遍的拥戴。这种文学现象的造成,是与理论界对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强烈支持、竭力倡导分不开的。

抗战前夕,理论界就把关于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旧形式利用”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抗战之后和整个抗战期间,理论界对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和民间形式如何运用等讨论得更加热烈,人们普遍对此持肯定态度。还有就是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所涉及到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即民间形式(向林冰提出引发)的问题等,其中虽然有意分歧,但对大众化通俗化的看法却是基本一致的。理论家们在各种场合纷纷发表看法,支持、倡导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民间文学形式的创作。郭沫若更是大声疾呼:“一切文化活动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上,集中在于抗战有益的这一点……便是需要他充分的大众化,充分的通俗化,充分地产出多量的成果。”^[15]他还明确指出:“在目前我们要动员大

众,教育大众,为方便计,我们当然是任何旧有的形式都可以利用之。不仅民间形式当利用,就是非民间的士大夫形式也当利用。”^[16]就连对政治和艺术都有很高标准、要求的冯雪峰也提出:“抗战的通俗宣传品现在极端的需要,但有艺术力的这种宣传品则更需要。”^[17]当然,在推行民间形式方面,理论家中最为用心用力的首推老舍。1937年老舍曾会见冯玉祥,据《冯玉祥日记》载:“伊以大多文章皆不能普遍与民众,于是以民间大鼓词之形式,而注入新的内容,在山东曾一度实施宣传,结果大受民众欢迎,故以后仍拟继续著作,并拟散播于前线士兵中。”在抗战的八年间,老舍不仅身体力行,带头创作了大量民间形式的作品,同时又在各种场合多次大力倡导、支持通俗文艺的创作,甚至写了怎样进行通俗文艺创作的小册子,连续登载在报刊上,还亲自多次到各个研讨会、讲习班去演讲、指导。^[18]理论家们的言行举动,对大后方民歌民谣的创作、宣传,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强大支持,有利于民歌民谣的发展、繁荣。

(四)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创作

从作者参与的角度看,传统歌谣一般都是下层民间老百姓自发而零散的创作,偶有文人士大夫参与其间,也只不过是借其形式,抒发文人情怀,属“票友”性质,如白居易、刘禹锡。抗战时期大后方歌谣的创作则与前大不相同,不再是单一的民间下层百姓自发、零散的创作,而是社会各界人士自觉、主动、积极的参与,表达的是全民的抗日爱国的激情、斗志。这里面,不仅有普通市民的作品,还有大量社会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例如田汉、贺绿汀、老舍、冯玉祥、冰心、端木蕻良、赵景深等等,甚至连10来岁的孩童都加入其中(如写《抗战》的徐应潮10岁,写《大刀队》的志平12岁)。参与人数之广泛,歌谣作者之众多,令人慨叹。仅以《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计,就有署名作者446位,无名氏作者109位(占到总量的五分之一),还有未成年作者6位,团体创作2个。这种各阶层各方面人士都踊跃参与民歌民谣创作的文学现象,在歌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在其它文学样式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在这种热烈踊跃、齐心协力的创作情景下,大后方的民歌民谣若还不兴旺繁荣,岂非怪事?

(五)出版界的鼎力相助

抗战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交通、印刷、出版亦有了相当的基础和条件,更为关键的是出版界的态度,对抗战歌谣的出版、发行,给予了热情而全力的支持、帮助。这也应该是抗战大后方的民歌民谣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传统歌谣的传播方式不同,抗战歌谣主要是通过现代传媒如报纸、书刊杂志来进行传播的,这比起传统歌谣仅仅用口口相传的方式来传播,当然更迅速、便捷、准确,传播面和影响力也更加深广。^[19]我们要看到的是,其实,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新闻出版业是非常艰难的,经济环境、条件很差,工作、生活困难重重,但是出版界的人团结一心、抗日爱国,各个刊社顽强奋斗,用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出版抗日的书籍刊物,鼎力支持抗战文学的发展,包括大后方的民歌民谣,使其得到广泛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刊登民歌民谣的新闻媒体众多,达到近百家,并且大部分为畅销及主力刊物,例如《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文艺阵地》、《新民报》、《新蜀报》、《商务日报》、《西北文化报》、《广西日报》、《西南日报晚刊》等等。这个阵容,不可谓不强大。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专门登载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如《抗战歌谣》、《战时大鼓词》、《抗战大鼓词》,以及全国文协和成都分会合办的《通俗文艺》等。另外,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少通俗文艺作品的书籍和小册子。这一切,足可见出新闻媒体的支持力度。

抗战大后方的民歌民谣集中体现了抗战时期社会各界对抗战精神的抒发与宣泄,对外来入侵敌人的仇恨,通过民间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与全国军民的精神状态。同时,由于抗战这个特殊时期的影响,使得传统的民间作者与社会上层文人的界限也得以打破,让大后方的民歌民谣归属到了全民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歌民谣已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不再是社会底层的下里巴人。可以认为,抗战大后方的民歌民谣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学的发展,为伟大的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独有的特殊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茅盾. 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A].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五册)[C].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2] 冯雪峰. 论艺术力及其它——文艺风貌偶瞥之三[A]. 冯雪峰论文集(上)[C].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3] 朱丕智. 抗战爆发与文学观的变移[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06, (4).
- [4] 重庆市档案馆, 重庆师范大学合编. 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二卷 战时动员[M].
- [5] 王元. 抗战总动员歌[A]. 周勇, 任竞. 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Z]. 重庆出版社, 2011.
- [6] 朱丕智.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批判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7]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A].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C].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8] 周作人. 平民文学[A].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C].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9] 新华日报.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社论)[A].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C].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10]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A].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C].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11] 老舍. 文章下乡, 文章入伍[A].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C].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12] 胡风. 论战争前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A]. 胡风评论集(中册)[C].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13] 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抗战文艺研究室.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文艺大事记[J].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 1981, (2).
- [14] 熊辉.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大后方文艺的引导——以《新华日报》副刊为例[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12, (1).
- [15] 郭沫若. 抗战与文化问题[A]. 郭沫若研究资料(上)[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6] 郭沫若. “民族形式”商兑[A]. 郭沫若研究资料(上)[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7] 冯雪峰. 关于“艺术大众化”——答大风社[A]. 冯雪峰论文集(上)[C].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8] 老舍. 老舍年谱(上)[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 [19] 李文富. 抗战大后方歌谣的阶段分析[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2012, (5).

On the Prosperity and Reason of Folk Song and Folk Rhyme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Zhu Xiaomin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Folk song and folk rhyme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ti – Japanese literature which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ry and social influences. Due to the impacts of social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it is not cared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become a blank item in the study of the anti – Japanese literature. However, it should be evaluated from the literary reality at that time and from the national stand and literary concept of historicism. Its prosperit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first, the duration is long, the authors are many and the number is large; seco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s wide, and the influence range is wide; third, the material themes are highly social, rich and profound; fourth, the literary forms are flexible, various and brilliant. The reasons for its prosperity are mainly as following: first, it adapts to the needs of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second,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literary societies and organizations;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fourth, the strong advocacy and support in theory field; fifth, the generous help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Keywords: anti – Japanese war period; rear area; folk song and folk rhyme; popularization; massification